

# 基于平行语料库的《文城》英译本译者风格与翻译策略研究

颜雨欣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7日

## 摘 要

本文自建余华《文城》汉英平行语料库, 从宏观语言特征与微观翻译策略两个层面分析Todd Foley英译本的译者风格。宏观层面通过标准化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高频词分布、句长、可读性等指标, 与另一位余华译者白亚仁的三部余华译作数据进行对比, 微观层面则分析了其对成语的翻译策略, 以及语态转换与流水句拆分。研究发现, Foley译文用词集中、句长适中、可读性低于白亚仁译作, 衔接以增补类连接词为主。词汇层面, 成语翻译依意象的跨文化可理解程度和叙事功能灵活采取直译或意译, 句法层面, 基于叙事焦点进行语态转换, 根据原文隐含逻辑进行长句拆分。总体而言, Foley译文呈现用词朴素、结构忠实、策略灵活的风格取向, 为余华译介及译者风格研究提供了新个案。

## 关键词

《文城》, 语料库翻译学, 译者风格, 翻译策略

## A Corpus-Based Study of Translator Style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ity of Fiction*

Yuxin Y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July 12, 2026; accepted: August 14, 2026; published: August 27, 2026

## Abstract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Chinese-English parallel corpus of Yu Hua's *City of Fiction* to analyze the

translator style of Todd Foley's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both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s. At the macro level, it compares the Standardized Type-Token Ratio (STTR), lexical density, the distribution of high frequency content words, sentence length, readability, and other quantitative measures with the corresponding data from thre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Yu Hua's works by Allan H. Barr. At the micro level, it examines Foley'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Chinese idioms, together with his use of voice shifts and the segmentation of Chinese flowing sentence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Foley's transl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concentrated lexical choices, moderate sentence length, and lower readability than Barr's translations. Cohesion is achieved primarily through the use of additive connectives. At the lexical level, Foley adopts either literal translation or free translation for Chinese idioms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cross cultural comprehensibility of their imagery and their narrative functions. At the syntactic level, he employs voice shifts to maintain narrative focus and segments long sentences according to the implicit logical relations in the source text. Overall, Foley's transl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plain diction, close adherence to the source text, and flexibl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providing a new case for th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Yu Hua's novels and translator style.

## Keywords

*City of Fiction,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or Styl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语料库翻译学是一种以语料库为基本工具的研究范式,通过观察大量的翻译事实与现象、并进行系统的数据统计与分析,来探究翻译的本质特征与运作过程[1]。语料库翻译学经历了学科地位确立(1993~1999)、学科体系完善(2000~2011)和研究疆域拓展(2012 至今)三个阶段[2]。研究者借助语料库工具,在翻译共性、译者风格、翻译规范等议题上取得了大量以实证数据为基础的发现。在这一学术脉络中,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尤为引人注目。Baker(2000)在其开创性研究中指出,译者风格并非一种无关紧要的装饰,而是一种指纹,通过一系列语言模式表现出来。她强调,译者风格研究必须聚焦于译者典型的表达方式,而非孤立的干预行为,即其区别于其他译者的个性化语言习惯特征[3]。这一方法论框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本路径。而后,国内学者进一步提出功能性译者风格的概念,强调译者重塑原作中主题重构、人物刻画、叙事构建等文学功能要素时所呈现的个性特征,可在语言描述与其文学功能之间建立联系[4]。

而作为中国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余华的作品已被译入多种语言。近年来,学界开始借助语料库方法考察其英译本的语言特征,主要从译者风格,译文语言特征,译文译介与传播以及译者行为批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比如,缪佳和邵斌(2014)以《兄弟》英译本为个案,从词语丰富度、词汇密度和形合度等维度分析了汉源英语译文的语言特征,探讨了翻译的共性特征[5]。在译介与传播效果方面,傅悦和吴赞(2021)借助语料库辅助方法,区分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考察了余华小说在美国的接受情况[6]。修文乔和孙燕(2026)则基于自建语料库,对白亚仁翻译的余华作品进行了系统的译者行为批评研究[7]。这些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参照,但它们聚焦的对象均为余华的早期或中期作品的英译,以白亚仁为译者主要研究对象。2021 年,余华时隔八年推出长篇小说《文城》,这部以清末民初为背景的作品延续了余华一贯的冷峻叙事,讲述了北方青年林祥福携女南下寻妻的故事,在历史动荡中展开一幅关于

执着与漂泊的画卷，成为 2022 年度中国图书(中文)海外图书馆收藏数量最高的图书，同年斩获第五届施耐庵文学奖。三年后，该作由 Todd Foley 译入英语，由 Europa Editions 出版。这一译本的面世为语料库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个案，它既是余华近年代表作的首个英译本，又出自一位相对年轻的译者之手，其翻译策略和语言特征尚待系统考察。

因此，本文基于自建的《文城》汉英平行语料库，从宏观语言特征与微观翻译策略两个层面分析 Todd Foley 英译本的译者风格与翻译选择。

##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围绕《文城》英译本的宏观语言特征与微观翻译策略两个层面展开。为此，研究首先自建汉英平行语料库并明确所用工具，在此基础上确定具体的分析维度，并引入相应的参照基准以增强数据的可比性，以下依次说明语料库建设、研究工具、分析维度三个方面。

### 2.1. 语料库建设

本研究自建《文城》汉英平行语料库，中文原文来自 2021 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文城》[8]，译文出自 2025 年由 Europa Editions 出版，Todd Foley 翻译的《City of Fiction》[9]，语料处理分为预处理、对齐、核校三个阶段。

预处理阶段：在 Python 环境中对中英文本分别清洗降噪，剔除空白行、章节标题、版权页和扉页等无关内容，处理编码错误导致的乱码字符，然后使用 jieba 模块对中文文本分词，输出分词结果。

对齐阶段：将清洗后的中英文本导入 Txmall，以句子为基本对齐单位，完成初步的句级对齐，输出为一一对应、一对多、多对一等多种对齐类型的候选句对。

人工核校阶段：对 Txmall 输出的全部句对进行人工逐条核校，重点检查以下三类问题：(1) 因译者增译、省译或句子合并或拆分导致的错位对齐；(2) 专有名词、方言词或成语翻译位置偏移造成的错配；(3) 软件误判的空对齐或重复对齐。核校采用单人通读两遍核对的方式，对存疑句对参照原文语境人工调整或标记为多对多对齐。

最终形成的《文城》双语平行语料库，可供 AntConc 等工具检索调用，为后续宏观特征统计与微观策略标注提供数据基础。

###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主要分为编程分析工具，语料对齐工具和语料库检索工具。编程分析工具，即在 Python 环境中编写脚本，调用 jieba 分词库对中文原文进行分词和成语识别，调用 textstat 库计算译文的 Flesch Reading Ease Score、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和 Gunning Fog Index 三项可读性指标，同时通过 Python 脚本按 1000 词为间隔计算标准化类符形符比(STTR)；语料对齐工具为 Txmall，研究使用 Txmall 对中英文料进行语句级对齐，构建双语平行语料库；语料库检索工具为 AntConc，文本预处理完成后使用 AntConc 进行词频统计、连接词检索和停用词过滤。但需说明的是，本文所涉及的中文字数与英文词数存在两种统计口径：计算中文原文总字数、英文译文总词数等基础信息时，参考 WPS 的统计结果，而在计算词汇密度这一具体量化指标时，则以 AntConc 基于其分词规则得出的形符总数为准，二者因分词算法不同存在细微差异，为保证词汇密度计算中分子分母统计口径一致，词汇密度以 AntConc 统计口径为准。

### 2.3. 分析维度

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分析。宏观层面聚焦于可量化的语言特征，包括标准化类符形符比

(STTR)、词汇密度、高频词分布、平均句长、可读性和连接词使用频率，微观层面则聚焦于具体的翻译策略，从词汇和句法两个角度切入。为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本文将与对白亚仁三部余华译著(《黄昏里的男孩》《第七天》《在细雨中呼喊》)的统计数据[7]对比，分析 Foley 与另一位余华译者在语言特征上的差异。

3. Todd Foley 译本的宏观语言特征

本节从词汇丰富度、高频词分布、句法特征和衔接手段四个维度分析《文城》译本的宏观语言特征，这些维度的数据共同构成了 Todd Foley 译本的风格指纹，即他作为一个译者在语言使用上的整体倾向。

3.1. 词汇丰富度与词汇密度

如表 1 所示，研究通过 WPS 统计中文原文与英文译文字词数与句数，最终得出英汉词字比约为 1:1.34。王克非(2003)基于大型英汉平行语料库的研究表明，文学翻译中汉译英的英汉词字比例通常在 1.25 至 1.5 之间[10]，而《文城》译作的数据落在这个区间内，说明译文在信息量上保持了相对稳定的传递。

Table 1. Basic statistics of the Chinese source text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corpus of *City of Fiction*  
表 1. 《文城》中英文语料基本数据对比

| 统计项目    | 中文原文      | 英文译文      |
|---------|-----------|-----------|
| 总字数/总词数 | 193,199 字 | 144,156 词 |
| 句子总数    | 3815 句    | 6800 句    |
| 平均句长    | 50.6 字/句  | 21.32 词/句 |

Baker (2000)指出类符与形符比用于衡量写作者或语料词汇的广度与多样性，即文本中不同词汇数量(类符)与总词汇量(形符)的比值。比值越高，词汇越丰富，比值越低，词汇使用越单一[3]。研究通过 Python 脚本以 1000 词为间隔计算了译文的标准化类符形符比(STTR)，以衡量文本的词汇丰富度。结果显示，《文城》译作的 STTR 为 38.32%。白亚仁三部余华译著的统计显示，STTR 分别为 37.83% (《黄昏里的男孩》)、44.27%(《在细雨中呼喊》)和 41.55%(《第七天》)[7]。《文城》的 STTR 与《黄昏里的男孩》较为接近，但低于《在细雨中呼喊》和《第七天》，表明 Foley 的译文并不追求华丽的词藻，他选择了更集中的表达方式，与余华原文的朴实风格一致。

为进一步验证上述发现，本研究采用 AntConc 的停用词表功能对译文的词汇密度进行了估算。使用英文停用词表滤除冠词、介词、连词、代词等功能词后，剩余实词的总出现频次为 67,674 词，占全文总词数 145,002 的 46.67% (AntConc 统计口径，与表 1 中 WPS 统计的 144,156 词因分词算法不同存在细微差异)，而 Laviosa (1998)对英语译语语料库的统计显示词汇密度约为 52.87%，原创英语文本约为 54.95% [11]，《文城》译本的词汇密度明显低于这个基准值。译者曾在翻译随笔中指出，余华没有纠结于历史准确性或传达特定方言的困难，而是选择了一种朴素的呈现方式，读起来往往感觉更口语化而非文学化[12]。词汇密度数据也证实这一判断，译文没有通过过多增加修饰语或解释性词汇来帮助读者理解，而是维持了原文那种信息密集但用词不复杂的风格。

STTR 和词汇密度两项指标都表明，Foley 译本的词汇丰富度偏低、用词相对集中，其译本的 STTR 显著低于白亚仁《第七天》和《在细雨中呼喊》，说明在同一作者的翻译中，不同译者仍然呈现出明显的个体差异，这一差异正是 Foley 个人风格指纹的一部分。

3.2. 高频词分布

高频词的分布能够揭示译本的叙事焦点和译者的语言习惯。本研究借助 AntConc 对英文译文进行词

频统计,发现前 100 个高频词中,人名和专有名词占据了 17 个位置,前 10 个高频实词中人名占 8 个。主角姓氏“Lin”出现 1199 次,“Xiaomei”出现 1046 次,分居高频词表第一和第二位。这种分布说明译文的叙事焦点高度集中在主要人物身上,没有因翻译而偏移。普通名词中,“Xizhen”(溪镇)作为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所,在词频上获得突出位置。除表格列出词外,高频动词如“left”“looked”“asked”“began”“felt”“heard”等频次均在 180 次以上,以感官和心理动词为主,译文较好地保留余华小说叙述的一个特点,大量依赖人物的感知视角来推进情节。

**Table 2.** Top ten most frequent content word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ity of Fiction*  
**表 2.** 《文城》英译本前 10 个高频实词

| 排名 | 高频词       | 频次   |
|----|-----------|------|
| 1  | Lin       | 1199 |
| 2  | Xiaomei   | 1046 |
| 3  | Xiangfu   | 1000 |
| 4  | Chen      | 684  |
| 5  | Aqiang    | 493  |
| 6  | Gu        | 459  |
| 7  | Xizhen    | 420  |
| 8  | Yongliang | 386  |
| 9  | bandits   | 381  |
| 10 | Yimin     | 326  |

在表 2 中,“Lin”作为姓氏词素出现次数位列第一,但它既可能指林祥福也可能指林百家等其他林姓人物。而“Xiangfu”作为林祥福的个人名出现 1000 次,位列第三,可被视为其个体叙事地位的更精确指标。由此可见,Foley 译本高频词分布所呈现的叙事结构和视角与原文并没有发生偏移,与小说情节的聚焦方向是一致的。

3.3. 平均句长与可读性

句长方面的差异为理解译者的句法处理提供了基础,如表 1 所示,中文平均句长 50.6 字,英文 21.32 词,中文句长约为英文的 2.4 倍,英文句数约为中文的 1.78 倍。这一差距宏观上反映了中英两种语言在句子组织方式上的根本差异,中文偏意合,句子内部通过逗号推进,而英文偏形合,要求主谓结构完整、从句关系明晰。根据张雯和付宁的句长分类标准,中句为 10~24 词[13],Foley 译本的平均句长 21.32 词正好落在这个区间内,说明 Foley 译文的句子长度总体适中,并未大量使用英文长句,而《文城》多流水长句,这也从侧面反映译者对原文长句意群做了适度拆分。

可读性,即一篇文本能让读者轻松阅读和理解的程度,它既是衡量译文质量的一大标准,也是译者需要追求的目标。本研究调用 Textstat 工具计算了《文城》译作的 Flesch Reading Ease Score (FRES)、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FKGL)和 Gunning Fog Index (GFI)三项可读性指标。如表 3 所示,《文城》译作的 FRES 为 73.44,FKGL 为 7.93,GFI 为 10.06,而白亚仁三部译著的 FRES 平均值约为 82.91,FKGL 平均值为 5.78,GFI 平均值为 8.25 [7]。由此可见,《文城》译著的可读性低于白亚仁译本的平均水平,更接近白亚仁所译《在细雨中呼喊》的难度。

**Table 3.** Comparison of readability measures betwee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ity of Fiction* and Allan H. Barr’s translated works

**表 3.** 《文城》英译本与白亚仁译著可读性指标对比

| 译著       | FRES  | FKGL | GFI   |
|----------|-------|------|-------|
| 《黄昏里的男孩》 | 90.99 | 3.83 | 6.40  |
| 《第七天》    | 82.19 | 5.85 | 8.23  |
| 《在细雨中呼喊》 | 75.56 | 7.65 | 10.11 |
| 《文城》     | 73.44 | 7.93 | 10.06 |

可读性数据的差异也源自译者本人对于翻译的取舍。译者本人 Todd Foley 就曾表示，他在翻译中做了一些不迎合业内标准化编辑预期的处理选择，他表示《文城》中一反常态加入了枯燥的历史细节，偶尔打断余华一贯快节奏的叙事，最明显的例子或许是林祥福外出向师傅学习时对各种木工的描述，这段文字可能显得多余且重复，为了翻译的可读性，本可以大幅删减，而不影响整体情节，然而，他主张完整收录，因为它不仅将小说与更广泛的背景联系起来，还指向更深层的社会结构[12]。译者的主要思想也暗示了他宁愿保留原文结构的复杂性，也不愿为了可读性而过度简化，可读性数据也为这一翻译取向提供了量化佐证。

3.4. 连接词使用频率

连接词的使用是语篇衔接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依据 Halliday 和 Hasan 在《英语的衔接》中提出的分类框架[14]，将连接词分为增补、转折、因果和时间四个基本类别，借助 AntConc 的正则表达式检索功能统计各类连接词在《文城》译作中的出现频率。

**Table 4.** Distribution of connective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ity of Fiction*

**表 4.** 《文城》英译本连接词分布

| 连接词类别 | 频次   | 每万词频率  |
|-------|------|--------|
| 增补    | 5253 | 362.27 |
| 转折    | 678  | 46.76  |
| 因果    | 560  | 38.62  |
| 时间    | 961  | 66.28  |

如表 4 所示，增补出现频率最高(5253 次)，占连接词总量的 70%以上。这一分布揭示了译文的一个重要衔接特征，译者倾向于使用累积式的语篇推进方式，通过“and”“also”“besides”等添加性连接词来扩充信息，而非频繁使用因果或转折类连接词来重构逻辑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余华原文的语言特点，中文意合句式本身不依赖显性连接词，译文虽因英文语法要求而增加了连接词的使用，但原文那种情景徐徐展开的方式仍被保留了下来。

文学翻译文本在连接词的使用上显著高于原创文本，文学翻译中的连接词有助于读者理解人物内心世界，增强叙述的连贯性与情感深度，使人物的感受更加真实立体[15]。从这一角度看，连接词在 Foley 译本中不仅是衔接手段，也在维持原文叙事节奏、传递人物情感持续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 Todd Foley 译本的微观翻译策略分析

然而，宏观层面的描写只能呈现译本的总体面貌，无法揭示译者在具体翻译面前的策略选择，白亚

仁就曾指出，余华的长句句式通常没有固定的语法结构，词汇丰富，并夹杂四字短语[16]。这一结论在《文城》中同样成立，本研究也将从词汇和句法两个角度考察 Foley 的具体翻译策略。

4.1. 词汇层面：成语的翻译

研究通过 Python 的 jieba 词性标注模块对中文原文进行成语识别，初步得到 653 个不同成语，总出现 1168 次。经人工筛查，剔除“闭上眼睛”“安静下来”等被 jieba 误标为成语的普通四字短语后，剩余有效成语 630 个，总出现 1089 次。随后用 Python 搜集各成语对应的翻译语段，对于翻译方法和技巧的定义，对各个成语所采用的翻译方法和技巧进行简单标注，在标注过程中，研究发现成语的翻译在宏观上呈现两大趋势。

4.1.1. 感知类意象成语的直译

表 5 中以“眼泪汪汪”“心不在焉”为代表的一类成语所描述的，是人类普遍的身体经验或心理状态，传递的是感知层面的意象，不依赖特定的文化知识即可被理解，直译可以在传递意象的同时完成刻画人物形象等叙事任务，因此译文以直译为主，在词汇意义及修辞的处理上不采用转义手法，但在语言形式上允许适当的变化以符合目的语规范[17]。

Table 5.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perception-related Chinese idioms  
表 5. 感知类成语英译策略统计

| 成语   | 频次 | 直译 | 意译 | 省译 |
|------|----|----|----|----|
| 眼泪汪汪 | 11 | 11 | —  | —  |
| 不由自主 | 9  | 6  | 1  | 2  |
| 心不在焉 | 12 | 12 | —  | —  |
| 忐忑不安 | 8  | 8  | —  | —  |
| 不知所措 | 7  | 7  | —  | —  |

以“眼泪汪汪”为例，该词指的是眼中饱含泪水的样子，形容激动或者悲痛等情绪，在译文中多处理为“filled with tears”等类似表达，例中两处译文均将“眼泪汪汪”处理为“eyes filled with tears”，完整保留了泪水充盈眼眶的画面，刻画出了人物悲伤的情绪。直译成立的条件是画面本身具有跨文化可理解性。“眼泪汪汪”描述的是一种人类共通的视觉经验，英语读者不需要额外的文化知识就能体会这一画面，因此直译可以在语义和画面两个层面同步完成传递。这一逻辑也适用于心不在焉、忐忑不安、不知所措等同组成语，感知的普遍性为直译提供了认知基础。

例 1:

中文：她说这话的时候眼泪汪汪，林祥福知道她是想留下一件林百家的衣物，十三年的朝夕相处使她们两个已是母女情深。

译文：As she said this her eyes filled with tears. Lin Xiangfu knew she wanted something to remember Lin Baijia—spending thirteen years together day and night had given them a bond of mother and daughter.

例 2:

中文：小美的弟弟此刻眼泪汪汪了。

译文：At that moment, the eyes of Xiaomei’s little brother filled with tears.

4.1.2. 文化负载类成语的意译

而另一类以“鱼贯而入”“风尘仆仆”为代表的成语(见表 6)，意象依赖汉语特定的文化联想和文化语境，直译会造成认知断裂。感知类成语直译即可兼顾叙事，而文化负载类成语的意象本身已不可直译，加之叙事功能在不同语境中多有变化，单一的直译难以在传递意象的同时兼顾叙事需要。因此译者主要是采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对成语进行转义，以流畅、地道的方式再现原文意义[17]。意译组内部依据核心语义是否随语境发生变化，进一步分为两种子类型：其一为意象替代型，即源语成语核心语义稳定，仅在喻体层面调整，其二为功能提取型，即同一成语在不同语境中核心语义发生偏移，译者提取不同侧面并以不同英文表达呈现。

Table 6.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culture-specific Chinese idioms  
表 6. 文化负载类成语的英译统计

| 成语   | 出现次数 | 直译 | 意译 | 省译 |
|------|------|----|----|----|
| 鱼贯而入 | 5    | —  | 3  | 2  |
| 昙花一现 | 4    | —  | 4  | —  |
| 风尘仆仆 | 4    | —  | 4  | —  |
| 鸦雀无声 | 3    | —  | 3  | —  |
| 毛手毛脚 | 3    | —  | 3  | —  |
| 披麻戴孝 | 2    | —  | 2  | —  |

第一类是意象替代型，比如说文中对于“鱼贯而入”的翻译：

例 3：

原文：宴席开始了，顾家的仆人鱼贯而入，端上来一盘盘精美的菜肴，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长的，能放进嘴里吃的几乎都有。

译文：The meal was served, and Gu Yimin’s servants filed in with dish after dish of exquisite cuisine, encompassing nearly everything edible that flew, swam, or lived on land.

例 4：

原文：小美的父亲双手插在袖管里，张嘴啊啊了几声，率领也是双手插在袖管里的另外四个鱼贯而入，走进里面的厅堂。

译文：Xiaomei’s father, his hands tucked up in his sleeves, voiced his understanding while ushering in the four others of his party. One by one, they entered the main hall.

“鱼贯而入”为偏正式结构，“鱼贯”为状语，修饰“入”，而两处译文均未保留“鱼”的意象，而是根据语境选择了不同的英文表达。“鱼贯而入”字面意为像游鱼一样前后衔接地进入，形容一个接一个、依次有序地进入，其意象依赖汉语特有的比喻，直译会使英文读者感到困惑或荒谬，因此译者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在例 3 中，“filed in”用“队列式进入”的核心语义替代了“鱼”的比喻意象，但保留了逐一衔接的秩序感，英语中“file in”最初是用来描述士兵站成一行，列队前进的场景，与“鱼贯”的功能对等。同时也呈现了宴席场景中仆人依次上菜这一动作的秩序感和场面感，与仆人服侍这一身份的庄重、规整相契合。在例 4 中，“鱼贯而入”描述的是小美父亲率另外四人进入厅堂的场景，核心语义并未发生偏移，译者同样舍弃了“鱼”这一比喻意象，但并未沿用“filed in”或类似的词语，译为了“One by one, they entered the main hall”。跟例 3 的“filed in”比，“one by one”同样保留了逐一进入的顺序，

但没有“*filed in*”那种动作齐整的意味，更像是简单地一个接一个走进去，没有章法或仪式感。这是因为小美家人是乡下来的穷亲家，说话都是“啊啊”两声表示明白，“*filed in*”这种带集体行进感、略显庄重的说法用在这里会显得错位，“*one by one entered*”更贴近人物拘谨局促的状态。

两处译文均舍弃了“鱼”的意象，但处理方式不同。例3中“*filed in*”保留了队列的秩序感，与仆人依次上菜的庄重场面相契合，例4中“*One by one, they entered*”则弱化了队列的整齐性，更贴近小美家人拘谨局促的状态。译者的选择既基于跨文化可理解性的考量，英文读者不需要理解“鱼”的比喻，只需要理解他们进场的方式，也兼顾了叙事中人物身份与场面氛围的差异，使译法在功能对等的基础上贴合具体叙事。

但习语翻译的首要困难在于目标语言中往往找不到形式与功能完全对等的表达，不同语言用不同方式表达同一意义，因此期待习语之间有对应关系是不现实的。更关键的是，习语往往是文化特定的，其翻译困难不在于某个特定词汇是否可译，而在于它所传达的意义及其与文化语境的关联[18]。作为习语的一种，成语的意义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必须在具体语境中才能被准确理解和翻译。以“风尘仆仆”为例，它在文中共出现3处，译者采用了不同的处理：

#### 例5：

原文：这期间有媒婆数次找上门来，为他介绍未来的新娘，他也跟随媒婆风尘仆仆去女方家中相亲，在那些与他门当户对的人的家里，他显得迟疑不决。

译文：Matchmakers had visited several times to introduce him to a future bride, and he dutifully followed them to the homes of these young women. Whenever he was in the home of a family of equal status and wealth, he appeared particularly hesitant.

#### 例6：

原文：父亲死后，母亲风尘仆仆了，每一年的麦收之后，田大牵着毛驴，母亲骑在驴背上前往城里的聚和钱庄，这样的情景让他回想时不由阵阵心酸。

译文：After his father died, his mother made the trip every year after the harvest—she would ride on the back of a donkey, led by Tian Da, and head for the bank. Thinking back on these scenes made his heart ache.

#### 例7：

原文：母亲病倒那年的麦收后，他继承母亲的风尘仆仆走向城里，当他下午回到家中时，母亲已离世而去，母亲是睁着眼睛死去的。

译文：After the harvest the year his mother fell ill, Lin Xiangfu continued this tradition and went into town himself. When he returned home that afternoon, his mother was already gone—she had died with her eyes open.

“风尘仆仆”为主谓结构，由“风尘”与“仆仆”组成。“风尘”指行旅艰辛，“仆仆”形容行路疲态，整体表示旅途奔波导致的劳累状态。三处译文均未使用直译，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意象的跨文化可传递性有限，英文读者难以从字面领会“风尘”与“仆仆”的组合如何指向劳累，另一方面，三处“风尘仆仆”所在的句子承担着不同的叙事任务，核心语义发生了变化。例5中“*dutifully*”提取了“风尘仆仆”在相亲语境中的态度内涵，林祥福跟随媒婆去相亲的行为背后，是完成娶妻生子之责的顺从尽责，原文叙述的张力在于林祥福“去”但“迟疑不决”，他顺从地跟随媒婆，却始终没有真正投入。例6中，“风尘仆仆”描述的是母亲为家族事务而忍受的旅途劳顿，叙述重心落在母亲持续的付出上，而译文“*made the trip*”则以平实、克制的方式保留了年复一年奔波的行为，让人物“心酸”的情感在简洁的叙事中自然流露。例7中“*continued this tradition*”将“风尘仆仆”抽象为一种可继承的家族传统，母亲每年进城处

理家族事务，儿子接替她继续做这件事，译者的处理将行为提升至代际传承的层面，意译为“tradition”后，这段旅程不再是一次性的劳累，而是被赋予了使命感和价值感，让情节更有分量。这三处处理方式的差异，表层动因在于译者对跨文化可理解度的考量，当源语意象在目标语文化中缺乏对应联想时，直译会造成认知错配，因此需要意译。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风尘仆仆”在不同句子中有着不同的核心语义，承载着不同的叙事功能，有时是刻画行为，有时是暗示代际传承，有时是刻画人物态度。译者无法直译，或找到单一英文表达同时覆盖以上所有层面，所以译者并非随意省略或替换，而是在每一处判断该成语在该语境中的核心功能与叙事功能，然后用英文中最符合该功能的方式进行呈现。

感知类意象成语如“眼泪汪汪”和“心不在焉”，描述的是一种跨文化的身体经验或心理状态，不需要额外的文化知识即可被理解。这一类意象具有跨文化普遍性，直译可以在语义和画面两个层面同步完成，可以在传递意象的同时完成刻画人物形象等叙事任务。但文化负载类成语如“鱼贯而入”和“风尘仆仆”的意象依赖汉语特定的文化联想，直译会带来困惑，难以在传递意象的同时兼顾叙事需要。为此，译者根据核心语义是否变化采取了意象替代和功能提取两种不同的意译处理方式，而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译者的选择都不仅为了化解跨文化理解的障碍，也在回应每一处成语在具体叙事中所承担的功能，无论是刻画人物心态，还是呈现行为本身，成语的翻译最终也服务于小说人物刻画和叙事发展。

## 4.2. 句法层面：主被动态的转换及长句拆分

句法特征是译者风格的重要维度。就《文城》英译本而言，这种句法层面的风格集中体现在两类处理上，其一是主被动语态的策略性转换，其二是对原文大量流水句的拆分处理，前者关乎译者如何在具体情节中重新分配句子的语义焦点，后者则关乎译者如何应对中英两种语言在句子组织方式上的根本差异。

### 4.2.1. 基于叙事焦点的主被动语态转换

在余华的《文城》中，叙述视角的流转与句法结构的安排紧密相连，主被动句的灵活转换是译本的一大特点。译者在处理主被动语态时，并非中文句法标记的机械对应，而是服务于叙事的策略性选择。当动作的承受者是叙述焦点时，译者用被动语态将其置于主语位置，将中文受事主语转变为英文被动语态，以保持焦点连续。比如：

例 8：

原文：在林祥福的记忆里，母亲这样的出门差不多有十来次，每次回来时包袱里都没有了彩缎，林祥福知道母亲没有看中女方，她将彩缎留下是为了给女方家眷压惊，这是多年来的风俗。

译文：As Lin Xiangfu recalled, his mother must have done this around ten times. Each time she returned, there was no longer any satin in her satchel, so he knew that his mother must not have taken a liking to the young woman—the satin had been left to help her family get over the disappointment, as was the old custom.

例 8 原文用主动形式“她将彩缎留下”陈述事实，但叙述焦点始终落在“彩缎”这一物品上，彩缎的去留直接关联着相亲的结果，代表母亲对婚事的判断，也承载着一方风俗。译者以“there was no longer any satin”描述彩缎去留的状态，但在翻译“她将彩缎留下”时，转而使用过去完成被动语态“had been left”，将“the satin”放在主语位置，使彩缎始终处于句法中心的地位。这一转换不仅呼应了前文“satin in her satchel”的焦点，也传达了原文中彩缎的被动属性，它并非主动选择留下，而是被母亲作为风俗的一部分留在了女方家中。被动语态的使用使英语读者能够自然地将注意力凝聚于彩缎所承载的叙事功能之上，正是承受者为焦点时，译者以被动语态维持焦点连续这一原则的典型体现。

反之，当施动者成为叙事焦点时候，译者又灵活转换，将施动者置于主语位置，如：

例 9:

原文: 现在他时常咒骂小美, 说小美是妖精, 儿子离家出走是被这个妖精迷惑了, 末了还会后悔叹气, 说小美初来时偷穿花衣裳那回就该休掉, 当初不该心软。

译文: Now he would often curse Xiaomei, saying she was a she-devil who had tricked their son into leaving them. Then he would heave a sigh of regret and say they should have sent Xiaomei back as soon as she stole that blue calico clothing right after she'd first arrived. He had been too lenient from the start.

例 9 原文虽包含“被”字这一被动标记, 但叙述焦点并非落在“儿子”这一承受者身上, 而是落在沈父话语中认定的施动者“小美”身上, 整段话的核心是沈父对小美的愤怒与指责。此处的“妖精”及“迷惑”并非叙述者的客观描述, 而是沈父的主观认知, 中文以“被这个妖精迷惑了”将“妖精”作为主动施事者置于“被”字之后, 虽句法上是被动结构, 但语义和修辞的焦点是“妖精”的主动作为, 这正是沈父指控的核心所在。译文选择主动语态“had tricked”, 将“she”(小美)置于主语位置, 以清晰的主谓宾结构完成对沈父话语中“迷惑”行为的转述, 使“她的过错”这一人物认知中的情感焦点在英语句中得到强化。译文使用主动语态, 准确再现了原文中沈父谴责的叙述意图, 而非将重心偏移到承受者身上。

译者的语态选择并非对中文句法的机械复制, 而是根据每一处情节的叙事任务, 在英语句法允许的范围内灵活配置主语与焦点。当叙述重心在于承受者所接受的结果时, 即使中文为主动句, 译文也倾向使用被动语态以维持焦点, 当叙述重心在于人物话语中认定的施动者及其行为时, 即使中文为被动句, 译文也可转用主动语态以凸显施动性。这种灵活性保证了英语读者能够准确捕捉到原文的情感导向与叙事张力, 体现了译者对叙事伦理的深刻理解和翻译自觉。两种处理都非对原文句法的简单复制, 而是译者根据每一处具体情节的叙事任务, 在英语句法允许的范围内重新配置主语与焦点的策略性选择。

#### 4.2.2. 基于隐含逻辑的流水句拆分

流水句是由几个小句前后连接, 不用关联词语, 没有显性的语法标记, 而构成的一种结构联系比较松散而语气灵活多变的格式。余华的语言风格以简洁、精准著称, 其叙事中大量运用了流水句推进, 读来一气呵成, 但对于翻译而言, 却是棘手难题。虽然原文多流水长句, 但根据语料库数据, Todd 的译本主要以中句为主, 也从侧面说明其有意识地对意群进行了拆分, 以小说开篇描写林祥福土地的段落为例:

例 10:

原文: 那是一千多亩肥沃的田地, 河的支流犹如蕃茂的树根爬满了他的土地, 稻谷和麦子、玉米和番薯、棉花和油菜花、芦苇和竹子, 还有青草和树木, 在他的土地上日出和日落似的此起彼伏, 一年四季从不间断, 三百六十五天都在欣欣向荣。

译文: He had over a thousand mu of fertile fields, crisscrossed by rivers and streams that stretched over the land like thickly tangled tree roots. Rice and wheat, corn and sweet potatoes, cotton and canola, wild reeds and grasses, stands of trees and bamboo—like the rising and setting sun, new crops sprang up to replace the old ones, flourishing throughout the four seasons.

原文是典型的流水句, 中间以逗号串联了多个意象群, 田地、河流支流、作物、昼夜交替、四季循环, 全部用一个句号连接。中文读者可以依靠语义的连贯性来理解这些意象之间的关系, 不需要显性的连接词, 但这种意合机制在英文中却行不通。译者将这个长句拆为两个句子, 第一句交代土地和河流, 第二句交代作物与季节更替。中文意合结构中的“日出和日落似的此起彼伏”, 日出日落是比喻, 此起彼伏是作物的交替, 在原文中靠语义关系自然承接, 但在英文形合结构则要求这种关系被明确标示出来,

译文以“like the rising and setting sun”引出比喻，用“new crops sprang up to replace the old ones”阐明结果，完成了从意象到意义的显化，让译入语读者能够更清晰地感受到原文的意境和情感。

例 11:

原文：小舟已经破裂瓦解，船板在狂风里分道扬镳，他知道自己不是坐在小舟里，而是坐在了木板上，接着这块木板也分裂了，他的身体腾了起来，衣服像是风帆那样鼓起，他的身体像是飞翔，又像是冲锋，飞檐走壁似的滑翔过去，后来撞在了什么上面，他掉落下来，昏迷了过去。

译文：The boat was in tatters—the deck had split apart in the wind. She knew he wasn’t actually sitting in the boat, but on a floating plank of wood. Then that plank broke apart and his body rose up in the gale, his clothing billowing out like a sail. He felt like he was flying, but also like he was charging forward, leaping over roofs and walls as if he were in a martial arts novel. Finally he crashed into something, fell down, and passed out.

林祥福为了寻找不辞而别的妻子小美，背着襁褓中的女儿一路南下。在乘船南行的途中，他和女儿遭遇了突如其来的龙卷风。原文(男性指涉，此处译作“she”，疑为印刷错误)的句式结构与叙事节奏直接服务于情节的紧迫性，逗号串联十余个连续动作，整句一气呵成，模拟了风暴席卷时人物无法喘息、只能被动承受的冲击感。译文将这个长句拆分为五个英文句子，在语义相对完整处设置断点，船板分裂(句 1)、人物判断(句 2)、身体腾起(句 3)、主观感受(句 4)、最终结果(句 5)。这种拆分既满足了英文形合结构的基本要求，也在每一句内部维持了紧凑的动作推进，译文的断点并非打断原文的流畅性，而是在满足英文句法规范的前提下，将原文隐含的逻辑层级，即物理事件、人物认知、主观感受和最终结果以显性句法结构呈现出来。

流水句的拆分是《文城》英译中最为典型的句法调整之一。中文流水句依赖语义连贯性推进，无需显性连接词，多个意象或动作以逗号串联一气呵成，而英文则要求通过断句、连接词和标点将逻辑层级明确标示。译者在这类处理中，往往在原文语义完整或逻辑转换处设置断点，将中文流水句拆解为英文的多个独立句子，同时保持每个句内动作的紧凑推进。

## 5. 结论

本文以自建的《文城》汉英平行语料库为基础，从宏观语言特征与微观翻译策略两个层面，对 Todd Foley 译本的译者风格进行了系统考察。研究发现，二者呈现出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宏观层面，Foley 译文标准化类符形符比与词汇密度均低于同类文学翻译文本及白亚仁三部余华译著的参照值，句长适中、可读性略低于白亚仁译本平均水平，衔接手段以增补类连接词为主导，这一整体面貌展现出一种用词朴素、不追求华丽词藻，忠实原文叙事结构的译者风格。微观层面，无论是成语翻译中依意象跨文化可理解程度和叙事功能所做的直译或者意译选择，还是主被动语态转换服务于叙事焦点的连续性，又或是流水句拆分在满足英语形合规范的同时保留原文逻辑与动作节奏，都表明 Foley 的具体翻译决策并非对原文结构的机械对应，而是灵活服务于叙事与情节推进这一深层逻辑。宏观数据与微观策略都反映出来，Foley 译本的风格，本质上是其宁愿保留原文结构复杂性，也不愿为可读性过度简化这一翻译理念在语言层面的反映。

现有基于语料库的余华作品英译研究多集中于其早中期作品及译者白亚仁，本文将分析对象扩展至余华近作《文城》及新译者 Todd Foley，丰富了对余华小说译者以及译本的研究，也为不同译者处理同一作者作品时的风格差异提供了一定参考。此外，研究将宏观量化指标与微观质性策略分析相结合的路径，为语料库译者风格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但同时，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研究仅分析了单一译本，尚未纳入更多的译者对余华或同类作家作

品的翻译进行横向比较, 所得结论的普遍性有待检验, 其次, 成语翻译及句法处理方式的判断标注主要由研究者人工完成, 虽经过反复筛查, 仍存在一定主观空间, 未来可引入多人标注及一致性检验以提高信度。本研究未涉及译文在英语世界的读者接受度, 译者风格的语言学特征与实际阅读效果之间的关系尚待进一步验证, 后续研究可考虑扩大语料规模、纳入更多译者与文本进行历时或共时比较, 并结合读者调查、书评语料等外部证据, 从语言特征与接受效果两个维度更全面地考察译者风格的生成与传播机制。

## 参考文献

- [1] 胡开宝. 语料库翻译学: 内涵与意义[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2, 35(5): 59-70.
- [2] 黄立波, 王克非. 语料库翻译学发展阶段与前沿动向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3, 55(5): 764-776+801.
- [3] Baker, M. (2000)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 *Target*, 12, 241-266. <https://doi.org/10.1075/target.12.2.04bak>
- [4] 李德凤, 吴侃, 李丽青. 语料库文体学视域下的功能性译者风格考察[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4(1): 70-82+148-149.
- [5] 缪佳, 邵斌. 基于语料库的英语译文语言特征与翻译共性研究——以余华小说《兄弟》英译本为个案[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4, 21(1): 43-49.
- [6] 傅悦, 吴赞. 语料库辅助下余华小说在美国的译介效果研究[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5(2): 34-45.
- [7] 修文乔, 孙燕. 基于语料库的白亚仁译者行为批评研究——以余华作品为例[J]. 中国翻译, 2026, 47(2): 99-107.
- [8] 余华. 文城[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1.
- [9] Yu, H. (2025) *City of Fiction*. Translated by Todd Foley, Europa Editions.
- [10] 王克非. 英汉/汉英语句对应的语料库考察[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6): 410-416+481.
- [11] Laviosa, S. (1998) Core Patterns of Lexical Use in a Comparable Corpus of English Narrative Prose. *Meta*, 43, 557-570. <https://doi.org/10.7202/003425ar>
- [12] Todd Foley (2025) Answering New Questions: Translating Yu Hua's *City of Fiction*. <https://worldliteraturetoday.org/blog/translation/answering-new-questions-translating-yu-huas-city-fiction-todd-foley>
- [13] 张雯, 付宁. 葛浩文翻译风格研究[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 60-61.
- [14] Halliday, M.A.K, Hasan, R. 英语的衔接[M]. 张德禄, 王珏纯, 韩玉萍, 等,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216-219.
- [15] 庞双子. “翻译共性”的动态考察: 基于历时语料库的多语体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4(5): 132-144+150-151.
- [16] Barr, A.H. (2012) Yu Hua's Fiction Heads West...or Does It? In: Liu, T.T. and Wong, L.K.P., Eds., *Style, Wit and Word-Play: Essay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Memory of David Hawkes*,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85-300.
- [17] 熊兵. 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以“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为例[J]. 中国翻译, 2014(3): 82-88.
- [18] Baker, M. (1992) *In Other Words*. Routledge, 68-69.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327579>